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三重逻辑意蕴

梁海飞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浙江省绍兴市, 312369;

摘要: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新理念是对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巨大挑战的审视思考, 也是全球各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中寻求平衡的指明灯, 为了这个目标, 习近平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和原则, 即: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了更好理解践行习近平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 可以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产生条件与基本内涵。

关键词: 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 逻辑意蕴

DOI: 10. 64216/3080-1486. 25. 08. 044

2013 年,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提出了“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021 年, 在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上, 面对人与自然之间日益尖锐的内在矛盾和国际环境治理国际合作的困局, 习近平系统论述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正式宣布中国要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2023 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共建绿色丝路,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为了更好地认识和践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 有必要梳理该理念产生的背景, 从理论、历史、实践三个视角进行考察, 以便将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的经验同世界分享, 以实际行动推动国际环保合作, 展现一个宽广大气的大国胸怀和担当。

1 在理论逻辑方面,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最新发展成果

1.1 传统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解析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是对资本主义在打破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谋取的发展进行的严厉批判。其一, 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引发大规模资源使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完成工业革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地区, 也最早体验了突破自然界限的代价。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伦敦的居民不管如何发财致富, 不管是资产者还是无产者, 都是“雾都”里的“环境贫民”。恩格斯猛烈批评过西班牙的农业资本家违背人与自然的“绿色协定”, 在遥远的古巴砍伐森

林, 甚至烧毁树林, 在暴雨来临后古巴只有“光秃秃的岩石”。人类在获得征服自然的暂时的满足之后, 自然对人类报复开始了。二是, 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方面的革新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马克思一方面赞赏资本主义社会的创新, 认为: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1], 另一方面又揭示了生产方式革新的动力来自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这种追逐金钱利益与地球生态有限性的矛盾直接导致人和自然关系更显激张, 技术革新也没有使资本主义社会人和自然的关系变得更和缓, 而是更紧张, 工人阶级也没有得到更自由的结果, 工人阶级依旧被禁锢的更严密、更苦难。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进步导致的更多的是物化社会、人和自然、人和人的不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产生的, 它无法通过生产方式内在的技术革新机制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病症。只有以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 才能以公共利益代替私人利益, 从根本上消除人、自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

1.2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内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面对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化和世纪疫情交错影响, 全球环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习近平基于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自然观, 继承并弘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生态文明思想, 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最新理论成就。同时也为破解全球环境困局实现这一理念提出“六个坚持”的路径和原则。习近平提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环境领域的具体展现, 属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一部分。该理念从基本要义、发展方向、治理方式、价值追求以及权责担当等多个方面,寻找全球环境治理的解决方案,并探索人类、自然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发展路径。

在基本要义上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界孕育并养育了人类,“人类本身是大自然的产物,是在其所处的环境中并与该环境共同发展而来的”^[2],因此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本,摒弃一切违背自然法则的错误行为,实现从征服自然到尊重自然,从统治自然到顺应自然,从破坏自然到保护自然的回归。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通过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解。

发展方向方面强调“坚持绿色发展”。转变和治理生态环境就是转生产力、促生产力。发展之路走慢了还可以后来居上,一旦走错了如同火车脱轨必定车毁人亡。所以,“要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增长方式”。坚定树立科技革命时代绿色发展的宏观向度,走科技驱动、创新驱动、结构转型、资源节约的绿色发展之路,才有可能将良好的生态环境建设成全球化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在治理方式上强调“坚持系统治理”。将“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看成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基本内容,才能实现对生态问题综合治理的目标。把整体观、联系观、系统观作为指导思想,协调生态系统内部各种关系,统一配置自然生态要素,科学评估和控制自然资源容量,重塑人与自然万物的辩证关系,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平衡维护目标。

在价值追求上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优美的生产生活环境,美丽的地球家园,是每一个地球村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的生态基础,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体现了中国对地球家园子孙后代的责任。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必然激化人与人争夺资源使用、承担环保责任等方面的矛盾。维护生态平衡,建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不仅有助于解决环保危机,还能帮助我们处理与人类未来和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发展模式、公平与责任等问题。坚持“以人为本”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更加关注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彰显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制度优越性。

在权责担当上强调“坚持多边主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人类自出现之日起就具有共同体的意识,能够共抗挑战

共担任务。由于自然环境的系统性和物质、能量传递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呈现更为明显的全球性特征,如气候变暖、生物物种灭绝、森林资源枯竭与水污染等,这是涉及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危机,各国和民族一定要加强地球村意识和全球意识,单边主义、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无助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我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合作而非指斥,坚守而非朝令夕改,诚信而非失言”。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根本,由于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巨大差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治理全球环境问题要承担不同的责任,发展中国家要大力向发达国家学习资金帮扶、技术转让与产业转型等方面的工作,提高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协同治理的实效性。

2 在历史逻辑方面,“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是基于对人类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最终迈向生态文明的历史反思与考量

生产力的进步引发了生产技术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导致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各种文明形态因此不断演化。普列汉诺夫指出,社会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会随着生产力的提升而发生变化。人类通过劳动和劳动创造推动技术革新,技术革新带来的生产力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增强人在自然面前的自信心和胜利感,人类认识了自然规律有时也破坏了自然规律,人类看似征服了自然有时也被自然所征服。

2.1 从原始文明对自然的敬畏依存中,人类认识到生存的根基在自然

在悠长的原始文明时期里,人类祖先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中基本无力可施,仅仅只能在某个小尺度内提升自身能力,而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也多在某个“孤立的地点上”。^[4]因为不了解自然,对自然的人类行为多表现为被动顺应、盲目崇拜和过分依赖,加之人类的生产工具及技术发展极其缓慢,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微乎其微,地球的生态圈保持着一贯的稳定与平衡。人类、自然、社会处于协同进化的关系之中,这是一种人和自然处于相对和谐的良好共生状态。

2.2 从农耕文明对自然的利用改造中,人类认识到利用自然需要尺度和平衡

随着人类步入农耕文明,由于青铜器、铁器等新式生产工具的出现,人口急剧膨胀,人类定居并由狩猎而转入畜牧,人类对自然界的干扰作用明显增强。农耕文明时期虽然也发生一些因过度牧养与打猎以及无限度开采利用自然而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甚至引发明

倒退的现象,但是,由于该时期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当时全球性的生态灾难或根本性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状况并没有发生。

2.3 从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掠夺中,人类认识到无限索取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及其带来的毁灭性后果

工业文明短间内创造了丰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一成就强化了“人是自然的主人”这一幻觉,资本的逻辑赋予“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制度合理性。但是当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进一步激化了人、自然、社会的矛盾。同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代资产阶级国家和个体为了获得个别国家利益和个体利益,对全球环境危机奉行单边主义路线,无法构建全球环境治理的长效协调机制。

2.4 在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的进程中,人类认识到与自然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是后工业文明时期对人类生态问题突出、资本主义技术手段失灵、全球环境治理合作不易的回应,它从全人类利益和全球生态系统高度反思生态危机,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束缚,把山水林田湖草沙作为一个统一的生命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使人类从工业文明发展为生态文明。

3 在实践逻辑方面,“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反思与重构中国式现代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创造性实践

3.1 新中国致力于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环境保护的艰苦努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定胜天”、“向大自然开战”等观点为后面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失衡埋下伏笔,激进的农业发展思路导致浪费大量的森林土地等资源。但与此同时,新中国建设初期也有通过出台工业污染防治标准、起草以“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为中心的农业发展纲要、启动“爱国卫生运动”来号召大家建设“绿色祖国”等环保目标,虽然这些环境环保概念、方针具有一定的急于求成的色彩,但体现出党争取尽早解决环境问题、对人民负责任的初心。

3.2 在改革开放阶段,促进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正饱受严重破坏的生态危机,便把保护环境上升为基本国策,并且出台了土地法、大气法、海洋法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国家法律。新千年开始,全面落实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从以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模式脱离出来,为欠发达县域 GDP “摘帽”。2003 年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考察安吉余村后在《浙江日报》的“之江新语”专栏里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再次强调走保护环境、绿色发展道路的重要性。

3.3 新时代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生态协同治理日益困难的现状,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出“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5],国内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加强环境执法与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加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通过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山海协作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等推动区域共同守护生态环境。国际上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坚持多边主义和履行《蒙特利尔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巴黎协定》等国际环境公约,抵制全球环境治理上的单边主义,主张并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5.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6.
- [5] 习近平.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5.

基金项目:2023 年度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项课题(145383);2025 年度绍兴市上虞区社科联重点资助项目。